

一苇杭之

查明建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查明建 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一苇杭之

查明建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查明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苇杭之 / 查明建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10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 王向远主编)

ISBN 978 - 7 - 5117 - 2324 - 6

I. ①一… II. ①查… III. ①文学翻译 - 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4892 号

一苇杭之

出版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邓彤

责任印制: 尹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328 千字

印张: 25.25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起步发展，到现在为止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有了丰厚的知识产出和思想建树。它的异军突起，是当代中国一道引人瞩目的学术文化景观，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鲜明印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已经表明，要在人文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建立世界观念和视野，要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要把外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加以审视和阐发，要连接中外文学，要打通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壁垒，要把细致微观的实证研究与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相结合，那必然会走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这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比较文学”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世界文学”则是学科资源与研究视野。它在贯中外、跨文化、通古今、越科界的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中最有时代性、最有包容性、最有创新性的高端学科之一。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等方面生产了大量的新知识，而且逐步建立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学科理论系统，逐步完善了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分支学科，在学术成果的质与量

上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还全面进入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和中心，代表着世界比较文学兼收并蓄、超越学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收在这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作者，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是继季羨林、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的第二代学人。这些作者固然只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一部分，却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现年多在四十五至六十五岁之间，从学术年龄上说大体属于中壮年，都是各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大都在1980年代后走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道，1990年代后崭露头角或脱颖而出，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里，更成为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有幸拥有了可以安心治学的环境，赶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既抬头看世界，又埋头务笔耕，既坚持学术的严谨，也保持思想的活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充分发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和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取得了与时代要求相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个人学术履历的证明，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份奉献，更成为新时代“国人之学”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二十卷，选题上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理论为主，以讲述和示范学术方法为要，涉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基本理论、比较诗学、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及中西文学关系、世界文学总体研究等方面。各卷均按一定的范围和主题，将作者有原创性、有特色的成果收编起来，将大学讲堂搬到书本上来，以读者为听众，以写代“讲”，以言代“堂”，深入浅出，以雅化俗，汇集中国比较文学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以使五指成拳、十指合掌，形成大型丛书的规模效应，得以占书架之一角，入读者之法眼，从一个侧面展示近年来中国比较

文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而且，不同作者及著作之间也可以相互显彰、相互映照、相互补充，读者也可以在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在参读和比照中领略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得窥比较文学殿堂之门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编者和作者深表谢意！

愿“讲堂”满座，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事业更加繁荣！

王向远

2014年4月20日

自序

承蒙向远兄相邀，将已发表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结集成书，纳入他主编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丛书中。这是我第一次编辑个人论文集，却顾所来径，趁机回顾和梳理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学术历程和思想理路。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我最早关注的是影响研究。虽然影响研究受到以韦勒克、雷马克为代表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但影响研究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毕竟，影响研究仍是文学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那么，影响研究该如何拓展、如何深入？这是我深感兴趣的问题。读到叶舒宪、王富仁、赵明等学者的文章，我觉得中国学者一些成功的比较文学实践及其所运用的方法，对深化影响研究具有启迪意义，应该加以总结和发扬，因此撰写了《影响研究如何深入？》、《影响研究如何开拓？》、《旧学商量加邃密》等文。1990年代，陈思和教授提出了“世界性因素”概念，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很具有学术生发性，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开拓了新空间。《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沪上比较文学学者座谈会，对该命题进行讨论。我参加了座谈并发言。我结合思和教授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继续思考如何深化影响研究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问题。当时，思和教授全面阐述其“世界性因素”命题的文章尚未成文发表，只是在不同场合谈了一

些想法和设想。他让我不妨把自己的想法和不同观点先写出来发表,或许有助于他对“世界性因素”问题更全面的思考。我因此撰写了《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算是我那几年对如何深化影响研究以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点心得。我认为,当代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已内在地包含了接受研究,即将影响接受者的主体性纳入了影响研究视野。影响研究,包括实证研究方法,不应完全排斥。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存在的形态确实非常复杂,有明显的模仿、借鉴的直接影响关系,有受文化语境、文学风气氛围的感染等间接关系,也有创造性转化后无法查证、无迹可寻的模糊关系,还有面对类似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契合关系。针对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复杂现象,需采取互文性研究方法,对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研究。

从影响研究到互文性研究,又引发我对如何深化平行研究的思考,由此进入对可比性的思考以及文学性间性(interliterariness)的研究,已撰写了三四篇相关文章,因尚未发表,这次就不收入文集中了。

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后,谢天振教授让我来接任他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文学原著选读》教学。《深入开掘和充分利用比较文学的思想资源——谈“比较文学名著选读”课的教学》一文,就是我们对这门课程思考的结果。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外比较文学,无论是对学科发展的理论认识,还是在研究范围、对象上,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范围日趋广泛,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比较文学已成为国外人文学科领域最具活力的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比较文学处于复兴阶段,对国外比较文学的发展非常关注,也译介了一批国外比较文学论著。但 90 年代之后,我国比较文学界对国外比较文学的发展情况,则显得比较隔膜,更缺

乏系统的研究和借鉴。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比较文学，我觉得应该体现外国语大学开设比较文学的优势和特色，让研究生通过阅读原著，了解当下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动态，以帮助他们了解和关注比较文学学科的前沿问题。鉴于此，2003年后，我又开设了《当代欧美比较文学研究》课程。该课程从当代欧美比较文学发展中提炼出若干专题，指导研究生在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背景、原因及其拓展比较文学学科内涵的意义。

2008年，我申报的“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系列研究”课题成功获得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研究项目立项。该系列研究包括《北美比较文学发展史》、《欧洲比较文学发展史》、《亚洲、拉美、非洲比较文学发展史》、《当代欧美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当代欧美比较文学名著导读》。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逐渐成为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和走向对国际比较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根据自己对美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及对其近十几年来发展走向的思考，撰写了《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一文。我认为，美国学派虽然开拓了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新领域，但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缺乏足够的理论建构，导致了后来的泛学科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美国比较文学出现理论热、文化研究热的原因，探讨了对比较文学发展的利弊，最后指出了美国比较文学的诸多悖论，及其值得比较文学学者思考的问题，如后欧洲中心主义时代，比较文学如何实现文化跨越，跨界、跨学科的研究如何体现比较文学性质，韦勒克、雷马克时代的比较文学观念要不要、又如何更新，等问题。

“世界文学”是继“文学经典”之后，国际比较文学又一重要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趋频繁。歌德、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世界文学”愿景，由朦胧而逐

渐清晰，离我们也似乎并不再那么遥远。“世界文学”逐渐又成了比较文学学者所关注的议题。1993年，大卫·达姆罗什出版了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并发表了多篇论述“世界文学”的文章。达姆罗什提出了不少关于世界文学的新观点，比如，“世界文学”是具体存在的，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世界上不同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文学流通和阅读的方式；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受益的文学；等等这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理论启迪意义，为重新探讨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极大兴趣，“世界文学”因而也成为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议题。我对世界文学问题也一直关注，2001年曾撰写过《“世界文学”：网络时代的可能性及其特征》一文。担任研究生课程《当代欧美比较文学研究》教学，又促使我比较全面和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2005年底，我成功申请到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项目，于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在哈佛大学从事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项目研究。期间，我留意收集有关世界文学讨论新进展的资料，并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讨论、交流。2008年8月，应王宁教授邀请，我参加了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ward the Stage of World Literature），我作了题为“Power Discourse, Translation Selection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的发言。随后，我又赴韩国，参加了第19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本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比较的世界文学”，我在会上宣读了题为“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论文。1997年，中国教育部对学科目录作了调整，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划归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由此引发了我国比较文学界关于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如何结合问题的热议。鉴于中外比较文学界都对“世界文学”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学术热情，我因此提议《中国比较文学》开辟“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栏，就“世界文学”议题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形成中外比较文学学者的对话。我的提议得到主编谢天振教授的赞同和支持，因此，我负责策划、主持了《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栏目。栏目开设了三年，众多学者发来相关稿件，我本人翻译了《歌德论世界文学》、弗兰科·莫莱蒂的《对世界文学的猜想》、安德斯·彼得森的《跨文化文学史：穿越世界文学观念的局限》，并组织翻译了大卫·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民族语境》等文章。由于栏目的需要，我撰写了《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我的主要观点是，文本层面上的世界文学，既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其发展目标。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应是研究从世界文学中凝练出的富有普遍诗学意义的问题，以建构诗学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即“总体文学”。从当下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来看，世界文学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而关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的实践形式以及世界文学研究新路径。达姆罗什、莫莱蒂等人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新方法。全球化语境进一步密切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学观念的更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体现了比较文学意识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体现了比较文学性质，而呈现出比较文学化的趋势。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对比较文学未来发展走向具有较大启迪意义。19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越来越热衷于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脱离了文学本体，而热衷于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致使比较文学学科边界无限扩大，迷失了学科的发展方向，模糊了本学科本体性目标，忘了本学科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这两篇文章发表后，

都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可见,“世界文学”不仅是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议题,我国人文社科学界对此话题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另一个着力较多的研究领域是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研究。我硕士阶段师从谢天振教授研读译介学。天振师是我国译介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开创者。他对如何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以及关于翻译文学、翻译家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地位的论述,让我深受教益和启发。《试论新时期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关系》、《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的译介及其“影响源文本”意义》就是运用比较文学和译介学理论方法研究新时期文学翻译的尝试。后来,我还结合自己对译介学的理解,撰写了《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论译者主体性》、《现代主义文学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等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末,我读到王向远教授《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他就中国文坛对芥川作品既大量译介又批判否定的奇特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我由此联想到,新时期初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还比较严峻,译介者在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时,大多会对所译介作品持一种貌似批评甚至严厉评判、否定的态度,也采取了“既译介又批判”的方式。向远教授的文章给我很大的启发,“既译介又批判”由此作为我深入考察新时期外国文学译介现象的一个切入点。《外国现代派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和翻译策略》就是在这篇文章启发下撰写而成的。

我去香港攻读博士学位前夕,读到王宏志教授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很是惊喜!他认为,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著为中心,在语言技术层面上对译本好坏作对比,虽然不无价值,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应将时代文学、文

化、意识形态、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等诸多因素纳入自己的视域，即以译文为中心，将译本纳入译入语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化用意和翻译策略以及译本读者的文化心理反应，如此才能揭示翻译现象和译本背后潜隐的历史原因，从而真正确立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宏志教授的论述，不仅让我进一步认识到，翻译研究除研究“如何译、如何译得好”之外，还应有另一个研究层面，即从译入语文化层面来研究文学翻译。此外，他论著中的7篇研究个案，有机地运用了西方当代翻译理论来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现象，我认为具有理论运用的示范意义。因我之前接受过比较文学的训练，读王宏志教授的这本专著，接受得比较快，并大有深获我心之感，受益良多。

2000年，我前往香港岭南大学师从张南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南峰师是中国最早呼吁建立翻译学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描述翻译学研究的权威学者，尤其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方面，建树卓著。在南峰师的指导下，我系统研读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2001年，台北《中外文学》邀请南峰师主持编辑“多元系统研究专号”，得南峰师提携，也邀我撰写一篇，我因此撰写了《意识形态、翻译选择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透视中国五十——七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这是我首次尝试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探讨中国翻译文学的文章。文集中收入的《论译文之外的文化操纵》、《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权利话语、文学翻译选择与文化利用》等文章，就是运用当代翻译理论，并结合比较文学方法，研究20世纪翻译文学的一点成果。

《论译文之外的文化操纵》一文是我应罗选民教授邀请，参加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的会议论文，会后没拿出去在期刊上发表，后收入选民教授主编的《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论文集中。这是我

对如何突破译文对比模式来研究翻译文学的思考。所谓“译文之外”就是指译本的副文本(paratext)。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已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但研究的关注点一般只是集中在文本层面,即通过译文中的增删、改写现象来分析译入语的文化操纵,而忽视了文本之外的操纵策略。我认为,文本之外的翻译操纵,从总体上决定了翻译作品在译入语中的价值意义和读者的接受取向,因此比文本层面上的操纵在程度上更为深刻,影响也更大。

1999年开始,我与谢天振教授合作撰写《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这是中国比较完整梳理和叙述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发展史的著作。当时电脑使用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网络上有价值的信息资料非常少。尽管从史料搜集到全书完成、出版,耗时费力,前后花费了七、八年的时间,但本书完成后,我就感到不满足,继而开始着手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20世纪翻译文学史论”性质的著作,试图运用比较文学和当代西方理论方法,将翻译文学的发展放置在具体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考察,从典型的翻译现象分析着手,挖掘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探讨各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形态、特点、历史文化原因以及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影响和互动关系。

我对翻译文学研究的兴趣,是与影响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相伴随的。因为,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文学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翻译文学的生产方式、性质以及翻译文学在译入语中的地位 and 影响。既然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外”(外国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翻译文学,那么,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外国文学”,实为翻译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创作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都处在共同的文学语

境中，共同受制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文学观、文学体制，而被纳入同一文学轨道，构成了异质同构关系，共同作用了文学系统的发展演变。因此，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必然涉及翻译文学；而翻译文学研究的深入，自然又进入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层面。翻译研究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两者相辅相成。

自2004年起，我为研究生开设了《翻译文学研究》课程。这门课结合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和文化理论，探讨翻译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范围和研究目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语境中观照翻译文学的发展，探讨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特点、原因。通过对翻译文学史上典型现象的分析，探讨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意义及其与创作文学的关系。开设这门课程，更促使我对如何深化翻译文学研究的思考。近些年来，翻译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创新和深化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课题简单重复，机械地套用翻译理论术语而缺乏问题意识，因而也就不能体现翻译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总之，影响研究、中外文学互文性研究、翻译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讨，是我这些年来主要的学术兴趣点。看起来似乎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对我本人而言，是相互贯通、彼此系连的。

王元化先生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刘梦溪先生提倡“有性情的学术”，这都是我向往的学术境界。理想的学术研究，学术性和思想性应融为一体，而学术文字的背后，自有个人性情存焉。无论是比较文学研究，还是翻译研究，都应如此。这自然是更高的要求，也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最后，我解释一下这本个人论文集的书名。向远兄约稿时，提醒我，为使全套丛书书名整一，书名都用四字结构。我一般倾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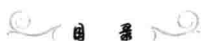
术文章的题目和著作的书名不必太文学化、诗意化，点明问题主旨，一目了然就好。我本拟用“超越比较”作为书名的，后来想想，还是用现在的“一苇杭之”。

我比较喜欢“苇杭”意象。芦苇在中西方都有隐喻和象征意义。西方的芦苇意象寄寓了哲思，如帕斯卡尔（1623—1662）的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中国的芦苇意象则喻指了情思，如《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此外，芦苇还象征了向往、信念和意志，如《诗经·卫风》中的《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多年前，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苇杭”，是准备用于文学创作署名的。

在汇集、整理论文的过程中，我不禁联想起当初写某篇文章的情景，引发对过往的诸多回忆，感慨良多。因此，本书既是学术论文集，也是自己生命历程的“潜文本”，潜含着憧憬、追求和个人性情。那就姑且预支本拟用作自己散文集的书名，用“一苇杭之”作为这本学术论文集的书名吧。

不仅如此，“一苇杭之”也蕴含了我对比较文学的热爱。

比较文学领域何其博大精深，像浩瀚的海洋，而自己只是一支纤纤的芦苇，在这座海洋里载沉载浮。但由此领略了比较文学浩瀚的魅力，也就够了。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目 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王向远 1
自 序	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	1
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3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	15
“世界文学”：网络时代的可能性及其特征	29
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	38
是什么使比较成为可能？	62
比较文学研究：中国视角与方法	67
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	
——兼论影响研究	69
比较文学对提高外语院系学生人文素质的意义	87
深入开掘和充分利用比较文学的思想资源	
——谈“比较文学名著选读”课的教学	91
中非人文交流视域中的非洲文学	
——《非洲小说选》序	98
《外国文艺》的世界文学眼光与中国文学意识	105